



照片：由欧洲中央银行提供。

说服市场

彼得·普雷特重温欧洲央行在面对欧元危机时采取的一些非同寻常的货币政策

丽贝卡·克里斯蒂

2019年6月，比利时央行行长彼得·普雷特（Peter Praet）在担任欧洲央行执行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八年后正式卸任。在回顾自己过去在一线工作的岁月时，普雷特向记者丽贝卡·克里斯蒂（Rebecca Christie）讲述了自己任期内最愉快的时光。这次采访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幕。正是因为这场危机，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2012年7月做出了著名的承诺：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欧元。这一史无前例的承诺不仅减轻了市场恐慌，而且使决策者有时间坚定执行自己在应对危机时的承诺，并勇敢面对接下来在负利率时期振兴欧元区的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挑战。

《金融与发展》：在你进入欧洲央行工作时，当时的氛围怎么样？

普雷特：2011年6月，在金融危机爆发几

年后，我进入欧洲央行工作。2012年1月，我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当时的情况不太好，因为当时的环境就像2008—2009年我在比利时银行业危机期间经历的那样。可这一次是市场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要时刻准确采取果断的措施。2011年7月，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是否要提高利率。当时，我还不是首席经济学家。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支持这个决定。

尽管那时金融危机已经爆发，而大家的想法仍是尽可能避免油价上涨所带来的二次影响。当时的通胀率接近3%，还存在工资压力。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当时，主权债务市场的局势也很紧张。2011年，我们采用了一种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首次加息是在春季，接着在7月再次加息，我就是在那时加入欧洲央行的。可在当时，由于金融行业获得了充足的流动性，人们仍认为金融危机是可控的。

如今我们明白，事情并非如此。

《金融与发展》：当你意识到情况并无好转时，甚至在油价开始下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普雷特：当时的情况确实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开始讨论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金融政策架构，毕竟当时的局势更像是反通货膨胀，甚至更糟。

《金融与发展》：欧洲各国领导人在计划建立一个银行业联盟，由欧元区共同监管，并建立主权债务防火墙——欧洲稳定机制方面做得如何？哪些事情只能由欧洲央行做呢？

普雷特：可能只有马里奥·德拉吉才能阻止2012年的市场恐慌。当然，他那句名言“不惜一切代价”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当时恰逢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6月召开的欧洲理事会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建立银行业联盟和危机管理机制。这就是当时的政治背景。

还真得要感谢马里奥。要想遏止市场恐慌，需要有强大的沟通能力。你必须要有能力说服市场。“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说的真好。

《金融与发展》:在你们的办法奏效后,你是否松了一口气?

普雷特:2012年底,市场恐慌消失了。当然,也产生了一种利好因素。这表明,我们可以采取措施来改变事件进程,控制事态发展。我想,这对激励我们继续做好工作来说,确实极为重要。

可在这之后,我们开始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些非常规的工具。这是继比利时银行业危机和欧元危机后,我应对的第三次危机。这次危机的性质有所不同。这是一场潜伏的危机,在逐渐展开。由于经济持续走弱,加之信贷市场失灵,通缩压力不断增长。

在利率已经处于极低水平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满足总需求。我们该怎么做呢?为此,我们提出了很多创新的和非常规的措施。

《金融与发展》:在这种局面下,需要怎样的领导力,需要做哪些准备?

普雷特:你必须坦诚对待你的员工和合作者,要学会换位思考,并让员工也能这样做。在充满压力的情况下,最关键的是要有团队精神。我总是对自己当时比较平静的状态感到惊讶。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是这个有凝聚力的团队中的一分子。

《金融与发展》:在危机期间,你如何看待IMF的作用?

普雷特:我记得IMF的使命之一是评估对欧元区进行独立的“第4条款磋商”评估的好处,而且当时对IMF是否过于支持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存在质疑。评估团队没有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矛盾或冲突,而是发现我们的看法非常一致。“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太近了,以至于批判性不够?”他们问道。我极力否认了这一点。

说实话,对于非常规举措,大家都没有很多经验。欧元区也不例外。日本和美国有一些经验,但背景不同。因此,我邀请了顶尖经济学家,他们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很了解。我发现和他们一起探讨让我获益匪浅。此外,与诸如IMF这样的可靠的外部合作伙伴对话也非常必要。

《金融与发展》:这种关系的不断深化带来了什么启示?

普雷特:将更多的资源投向那些在金融政策制定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人,这样做是有价值的。IMF可能会注意这一点。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目前处在低利率环境之中。在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要进一步降低利率,即使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甚至为负。而且要安排很多人去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从理论的角度,还要从实践的角度。这不同于传统的利率政策,毕竟我们在购买资产或是对未来做出承诺,我们称之为“前瞻引导”。

是否要将非常规变成常规,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议。这是我们要跟公众解释和说明的事情。在利率从零继续下滑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关注金融稳定性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当利率长期处于低位,我们应如何在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中更多地将金融稳定性问题纳入考虑范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如果考虑了金融稳定性,那么偏离价格稳定这一首要目标的风险就会增大。

要想遏止市场恐慌,需要有强大的沟通能力。

《金融与发展》:未来各国央行行长在沟通方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他们能否在推特这种简单的交流渠道与不太直接的渠道(比如演讲)之间取得平衡?

普雷特:总的来说,我不太赞成使用推特,尤其是央行的推特。这是因为不能把事情搞得太过简单,但也不能说一般人很难理解当下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努力向公众说明情况,但要当心,不能用太过简单的术语来描述复杂的情况。^[1]

丽贝卡·克里斯蒂(REBECCA CHRISTIE)是欧洲经济事务智库Bruegel的访问学者,曾任彭博新闻社、道琼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由于篇幅所限且为了表达得更清晰,本文对采访稿进行了编辑。